

中國民族古文字研究

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

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 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兵部书局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北下关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6.375印张 408千字

1984年8月第1版 1984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500册

统一书号：9190·027 定价：2.25元

目 录

序	傅懋勳 (1)
要重视民族古文字研究工作	翁独健 (3)
古代鄯善、于阗地区佉卢文字资料综考	马 雍 (6)
新疆佉卢文书中的 kos'ava 即“𑖀𑖄𑖅”考 ——兼论“渠搜”古地名	马 雍 (50)
焉耆一龟兹文的研究	李 铁 (56)
于阗文研究概述	黄振华 (64)
古代突厥文	耿世民 (87)
回鹘文	耿世民 (97)
吐鲁番出土的五件回鹘文文书	库尔班·外力 (105)
察合台文和察合台文献	安瓦尔·巴依图尔 (114)
从《突厥语词典》看喀喇汗王朝的文字	陈宗振 (127)
西夏文概述	史金波 (142)
我国发现的西夏文字典《音同》残篇的 整理复原与考释	岳邦湖 陈炳应 (169)
《番汉合时掌中珠》校补	吴峰云 (186)
吐蕃文献叙录	王 尧 (210)
河西吐蕃文书中的“钵阐布”	黄文焕 (222)
吐蕃工布摩崖碑考释	常凤玄 (237)
元帝师公哥罗古罗思监藏班藏卜1319年法旨考释	孟庆芬 (251)
傣族的文字和文献	张公瑾 (258)

彝文研究的基础和前景	陈士林	(271)
纳西族古文字概况	和志武	(296)
纳西族的象形文字	姜竹仪	(313)
契丹字研究概况	刘凤翥 于宝林	(318)
略论《契丹文字的解读方法》	于宝林	(329)
女真文字研究概况	金启琮	(345)
回鹘式蒙古文研究概况	道布	(362)
八思巴字研究	照那斯图 杨耐思	(374)
汉语影、么、鱼、喻的八思巴字译音	杨耐思	(393)
朝鲜文字的变迁	宣德五	(407)
介绍一种古代朝鲜语资料		
——《朝鲜馆译语》	黄有福	(421)
满文文献及其研究概况	富丽	(446)
壮族人民的文化遗产		
——方块壮字	张元生	(455)

序

1980年8月初，来自全国十四个省、市、自治区，包括十二种民族成分的八十八位少数民族古文字研究工作者和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出席了“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的成立大会和首次学术讨论会。在那次学术会议上，有十五位同志分别报告了我国各种少数民族古文字的基本情况和国内外研究动态。到会同志还分组讨论了各地少数民族古文字研究工作者提交的四十多篇学术论文。可惜当时我不在国内，未能躬逢其盛。现在，会上的报告和一部分学术论文经过整理、补充和修改，合编成一本文集跟读者见面了。这本文集涉及佉卢、焉耆—龟兹、于阗、古突厥、回鹘、察合台、西夏、藏、傣、彝、东巴、契丹、女真、蒙古、八思巴、朝鲜、满、方块壮字等文字。其中，多数文种已经是死文字，现在没有人使用了。有些文种经过不同程度的演进，至今仍然在少数民族中使用。这本文集不但介绍了我国一部分少数民族古文字研究工作者近年来的学术成果，而且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帮助我们认识伟大的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曾经创造了怎样光辉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我国历史悠久，民族众多，语言情况复杂，文字形制更是纷繁多样。这一点在世界上也是很少见的。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古文字，不但对于了解各兄弟民族的文化渊源，了解各兄弟民族的历史和相互关系，了解各种语言的结构及其发展变化有无法估量的价值，而且对于丰富整个人类的文字学知识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目前，我们的少数民族古文字研究队伍已经初具规模，在资

料搜集、文献整理和文字解读等方面都作出了一定的成绩。但是还有不少空白点需要填补。有些文种还没有着手研究或者不久前才开始研究。有些文种虽然早已有人研究，但是力量比较单薄。不少古文字的文献至今没有解读或者还没有能力解读。有些珍贵文献虽有翻译的可能，但因限于人力，只翻译了很小的一部分。我们期望年轻的一代有人立志填补这些空白，加强这些薄弱环节，为发展我国少数民族古文字研究事业做出贡献。这本文集的出版，除了起学术交流的作用之外，是不是也能起到吸引更多的同志参加少数民族古文字研究工作的作用呢？

我们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的成立和首次学术会议的召开，是经过翁独健先生的积极倡议和赞助才及早实现的。当这本文集即将出版的时候，我谨代表民族古文字研究工作者向翁先生敬致谢意。

祝少数民族古文字研究这朵科学园地中的奇花异葩开得更加光彩夺目！

傅 懋 勤

1982年11月12日

要重视民族古文字研究工作

翁 独 健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我国少数民族对祖国历史和文化的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形成的各种少数民族古文字,不仅促进了本民族历史文化的发展,同时也为我国光彩夺目的历史文化宝库增添了重要的内容。我国少数民族古文字种类很多,其中主要有佉卢文、突厥文、回鹘文、焉耆—龟兹文、于阗文、察合台文、古藏文、契丹文、西夏文、女真文、古蒙古文、八思巴文、彝文、纳西文、老傣文、满文等。用这些民族古文字书写的历史文献十分丰富,是我国民族文化遗产的精粹之一。这些珍贵的文献资料早就引起国内学者的重视,也为世界学术界所瞩目。

研究我国民族古文字及其文献,对社会科学的发展有相当重要的意义。首先,它对于文字学、语言学的深入研究有着直接的重要作用。它不仅为文字学的研究展示多种类型的宝贵资料,还为研究各民族语言的历史发展、演变规律,为研究各民族语言之间的关系和互相影响,提供了有价值的证据。对于历史学、民族学的研究,其作用也是十分显著的,因为这些文献往往记录着汉文史籍所缺少的、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资料。目前,国内外研究中国历史和社会的著作,已越来越多地运用我国少数民族古文字文献提供的资料,这为研究我国历史开辟了一个新的途径。写着民族古文字的文物,既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又是考古断代的确实依据。此外,民族古文字文献还包括有哲学、宗教学、经济学、文学、法学等方面的内容。用民族古文字记录的有关医学、天文

历法、地理、农业、手工业等方面的文献，也有相当的数量，这对科技史的研究，是很珍贵的。总之，民族古文字研究工作，对促进许多学科的发展，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作用。可以说，民族古文字是打开民族文化宝库的一把钥匙，应该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

民族古文字及其文献是少数民族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些文献记录了我国各民族之间历史上的血肉联系。因此，加强这一学科的研究，对增进民族团结，改善民族关系，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鼓舞各民族从事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促进少数民族的繁荣发展，都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解放前，反动统治阶级对民族古文字极不重视，致使不少珍贵文物遭到破坏或流失海外。当时，我国有一些专家认识到民族古文字文献的学术价值，他们为了发扬民族文化，不畏艰苦，努力钻研，在某些文种领域取得了成绩，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就整个民族古文字的研究而言，解放前还处于开创阶段。

解放三十年来，在国家大力支持和老一辈专家热心关怀指导下，我国已逐渐形成了一支具有一定水平的民族古文字研究队伍。

现在，我们民族古文字的研究，在若干文种的资料搜集、文献整理、解读和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有的学术著作在国际上也享有一定的声誉。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和研究人员的努力分不开的。他们充分了解这一学科的重要性，热爱自己的专业，事业心很强，深知其中的甘苦，有刻苦的钻研精神，有为祖国科学事业争光的责任感。

我国的民族古文字研究工作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总的看来，进展不够快，成果不够多，力量也还单薄，这与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进程是不相适应的。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近百年来，国外对我国民族古文字的研究和文献的搜集是十分重视的。东京、列宁格勒、伦敦、柏林、巴黎等地，都藏有大量的中国民族古文字文献资料。数十年来，国外对这些文献的研究从未间断，

特别是近些年来，一些国家投入了更多的人力、物力加强了这一学科的研究，培养了一批专门人才，出版了大量的研究著作，取得了相当的进展。相比之下，我国的民族古文字研究更应该有一个长足的发展，应该培养出更多的人才，在基本资料的整理和专门研究方面，应该取得更多、更大的成绩。

为了促进我国民族古文字研究的发展，1980年8月在承德正式成立了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同时举行了首次学术讨论会，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同年10月，又举办了《中国民族古文字展览》，正式展出了十六个文种的文字、文献以及国内外研究情况。举办这样大规模的民族古文字展览，这在我国学术界还是第一次。这一展览从民族古文字这个侧面展示出我国多民族大家庭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使更多的人了解、关心我国民族古文字研究的发展，促进了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

为了进一步促进民族古文字研究工作的发展，今后需要我们做大量的工作。首先，在搜集、保管和整理资料方面，要求文物考古、文献保管和科学研究机关加强联系，互相配合，使这些文献充分发挥作用。其次，要加强民族古文字研究队伍的培养和组织工作，为科研人员创造较好的工作条件。对老专家要尽可能配备助手，帮助他们整理研究成果。要使中年研究人员集中精力，鼓励他们多出成果。同时希望有关单位多吸收一些青年研究人员，使我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事业后继有人。希望各类科研人员加强联系，团结合作，经常交流学术资料和情报。同时要积极增进与国外的学术交流活动。当前，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要大大加强民族古文字学术资料和研究成果的印刷出版工作。近年来，不少研究人员已经写出一批具有一定水平的学术著作，需要有关部门和出版单位，从我国科学发展的长远利益考虑，在技术上和经济上给予大力支持。总之，希望有关方面共同关心这一工作，使我国科学园地中的这朵鲜花开得更加绚丽。

古代鄯善、于阗地区佉卢文字资料综考

马 雍

通常所谓“佉卢文”只是一种文字符号，用这种文字所书写的语言并不称为“佉卢语”，因此，称之为“佉卢文字”似较称“佉卢文”更为恰当。“佉卢”二字是“佉卢虱吒”一词的简称，该词来源于梵文。这个译名及其简称均出自我国古代佛经译本，已经相沿成习，所以字面虽然生僻，也不能另取新名了。

佉卢文字是由音节字母组成的，书写方式是由右向左横书，字母不连写；字与字之间无间隔，亦无标点符号。这种文字在古代曾使用于印度西北部、巴基斯坦、阿富汗、苏联境内的乌兹别克、塔吉克、土库曼等地以及我国新疆昆仑山北麓的古于阗、鄯善一带。各地区使用的年代早晚不同，使用时间的久暂也不一样。就目前所知，佉卢文字所书写的资料年代最早者属公元前三世纪，最晚者大约属公元后四至五世纪，前后流行了七百年左右。从公元五世纪以后，任何地区再也没有人使用这种文字；换言之，它成为死文字迄今已有一千五百多年了。佉卢文字所书写的语言属印度语支中的西北俗语。西北俗语包括各种方言，佉卢文字所表达的方言因地而异，虽然基本语法相同，也有许多明显的差别。由于使用的时间久、地域广，在字形方面自不免发生一些变化。但是，并没有从佉卢文字演变成任何其他文字。

这种文字早已被人们遗忘了。直到十八世纪时，考古工作者才首先在印度河流域重新发现它。经过古文字学家的研究，才能解读。起先并没有给它以固定的名称，或称为巴克特里亚文字，

或称为印度-巴克特里亚文字，或称为巴克特里亚-巴利文字，或称为雅利安-巴利文字，或称为喀布尔文字。1886年，法国学者拉古贝里(Terrien de Lacouperie)始使用“佉卢虱吒文字”一名来称呼它，其根据出自我国古代佛经译本。按隋代所译《普曜经》(Lalitavistara)称，净饭王令密多罗教太子(即释迦牟尼)学书，太子自述书有六十四种，第一种为“梵天所说之书”(即“婆罗门书”)，第二种为“佉卢虱吒书”，第三种为“富沙迦罗仙人说书”云云。此处所谓之“书”指文字而言。列举的六十四种文字中有实际存在的文字，包括汉文(“支那国书”)在内；有可能存在但目前尚未发现的文字，如疏勒文(“阿沙书”)；还有许多名称显然属于神话性或虚构的概念，并非实有。然而，佉卢虱吒书却是实有的文字。按《法苑珠林卷十五·千佛篇第五之三·游学部》提到这种文字，其文云：

“昔造书之主凡有三人。长名曰梵，其书右行。次曰佉卢，其书左行。少者苍颉，其书下行。梵、佉卢居于天竺。黄史苍颉在于中夏。梵、佉取法于净天，苍颉因华于鸟迹。”

此处所称之梵书与《普曜经》中“梵天所说之书”同指梵文所使用的婆罗迷文字(亦即所谓“婆罗门书”)，这自然没有疑问。此处所称之佉卢书显然也就是《普曜经》中之“佉卢虱吒书”。由此可见，佉卢文字是一种由右向左横书的文字，它与婆罗迷文字曾并行于印度。拉古贝里根据这一点将原先被人们称为“巴克特里亚文字”(或用其他名称)的那种文字定名为佉卢文字。此后，这个名称获得了学术界的公认。对它的梵文原字，或作 Kharoṣṭhī，或作 Kharoṣṭrī，学者们久未能定。至1896年，著名语言学家毕攸勒(G. Bühler)刊行其所著之《印度古文字学》(Indische Palaeographie)一书，决定采用 Kharoṣṭhī，由于该书的权威性，遂使这一梵文拼法成为普遍流行的定式。

至于“佉卢虱吒”这一名称的意义作何解释，迄今众说纷纭，

莫衷一是。据隋代所译《普曜经》本，在“佉卢虱吒书”一词下注云：“隋言驴唇”。唐末段成式《酉阳杂俎卷十一》亦称西域书有六十四种，其中有“驴唇书”，盖沿袭佛经之说。按梵文称驴为 *Khara*，称唇为 *oṣṭha*，二字连缀，前一词之词尾元音 -a 因与后一词之词首元音 o- 同化而略去，遂形成 *Kharoṣṭha*，意即“驴唇”。如将此词作为一种文字的名称，须把它的词尾改为阴性词尾 -ī，因而产生 *Kharoṣṭhī* 一词，意即“驴唇文字”。但是，为什么要将这种文字称为“驴唇文字”？这个问题仍有待于探讨。而且，苟如前文所引《法苑珠林》之说，则以佉卢为创造此种文字之人名，与苍颉相提并论。这种说法究竟出自中国译经者的臆测还是别有所据？这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关于这些问题，近代学者提出了五种不同的意见，兹简述于下：

其一，拉古贝里认为“佉卢虱吒”一词的词源并非来自梵文而是来自古波斯帝国阿凯门王朝的一位国王的名字。这位国王名 *Khusrau*，在楔形文字中写作 *Kyros*，或作 *Kuras*，或作 *kurush*。他在公元前540年以前曾征服印度西北边境地带，并将西亚地区的阿拉美文字引进印度。后来，佉卢文字就是由阿拉美文字演变而来的，因而印度人用 *Kyros* 的名字作为这种文字的名称。但在梵文中却把 *Kyros* 改变成 *Kharo-*，与“驴”字谐音，这种文字就被人们理解为驴唇文字了。按此说把 *Kharo-* 作为 *Kyros* 的转写，在字音的转化上毫无根据，故目前已无人信从。

其二，路德维希 (Ludwig) 认为“佉卢虱吒”的原文应作 *Kharoṭṭha*，而 *Kharoṭṭha* 一词又应当是梵文对阿拉美文 *harūttha* 的转译，此字的意义应为“镌刻、书写”。梵文作 *Kharoṣṭha* 者乃系转写之误。按此说立论点更为虚弱，因为所谓 *harūttha* 一词在阿拉美文中并非实有，而是路德维希根据词义和阿拉美文的构词规律设想出来的。所以，这种意见亦不足取。

其三，烈维(Levi)根据我国唐代僧人慧苑所撰之《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音义》以及澄观之《华严玄谈》、慧琳之《一切经音义》、希麟之《续一切经音义》诸书谓疏勒一地原名正音当作“佉路数怛勒”，还原为梵文应为Kharoṣṭra，因此认为佉卢虱吒文字的原文即应作Kharoṣṭri。Kharoṣṭri者乃Kharoṣṭra地方之文字，亦即疏勒文字也。烈维并由此进一步推想这种文字最早应起源于中亚地区而非印度地区。烈维此说遭到弗朗克(Franke)和皮舍耳(Pischel)两人的反驳。他们列举了许多理由认为慧苑以疏勒之原名当作佉路数怛勒一说并不可信，认为以此文字起源于中亚无事实根据；认为按照《普曜经》中将佉卢虱吒与富沙迦罗仙人说书排列在一起，后者即系人名，前者亦应是人名而非地名，认为此经所列举之六十四种文字中已另有属于疏勒之文字名“阿沙书”，则佉卢虱吒书显然不会是疏勒文字。按弗朗克与皮舍耳反驳烈维的理由，虽不是每一条都具有充分的说服力，但最后一条却坚实有力。因为，在六十四种文字中的确不应出现两种名称不同的疏勒文字。因此，烈维此后虽仍坚持己说，对这一点亦难以自圆。

其四，弗朗克与皮舍耳在反驳烈维的论文中没有明确提出他们自己正面的看法，但表示倾向于相信“佉卢虱吒”来源于人名。同时，他们指出，在印度许多神话中均出现Kharoṣṭa或与此相似的人名，在梵文中即写作Kharoṣṭha。因此他们认为《法苑珠林》中所谓佉卢其人居于天竺之说当属可信。

其五，普尔兹鲁斯基(Przyluski)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又提出另一种意见。他看到《大孔雀明王经》(Mahāmāyuri)叙述印度西北诸城的保护神时，提到其中有一位神名叫Yaksa Kharaposta，中文译为“驴皮”。在印度—雅利安语系中，通称“驴”为khara，但称“皮”为post则只能推源于伊朗语而与印度语无关。印度语中有pust或pustaka(“手稿”)一词，本义为“写在皮

革上的手稿”，此词亦从伊朗语之post借来。此外，在印度马都拉地方又发现一神名 Yuvarāja Kharaoṣṭa。因此，普尔兹鲁斯基认为 Kharapoṣṭa、Kharaoṣṭa 都是源自伊朗语的一个缀合词，意为“驴皮”；而这个缀合词中的第二个词post(“皮革”)为一般印度人所不能了解，于是印度人便以他们所熟悉的一位神名 Kharoṣṭha(“驴唇”)者取代“驴皮”神名。佉卢文字确有不少文献系写在皮革上者，可能其名原来出于Kharaoṣṭa(“驴皮”)，而后来与上述神名一样讹为 Kharoṣṭha(“驴唇”)了。换言之，佉卢文字的本义应为“驴皮书”，由于印度语的转写错误才变成了“驴唇书”。普尔兹鲁斯基之说被现代学者们认为是可能性最大的解答。然而，他的说法仍奠基于假定的误译之上，而且他又把神名与“皮革”这个原义两者交叉在一起，意在兼顾，结果反而没有说明白究竟这种文字之得名是由于神名还是由于写在皮革之上。

综上所述，对于佉卢文字名称的词源与涵义仍未得到圆满的解答。我想就这个问题提出自己的一点看法。

我认为，“佉卢虱吒”的梵文原名为 Kharoṣṭha，在印度语中的意义为“驴唇”，这既在梵文中找到实有的根据，又在隋代汉译的《普曜经》中得到证明，应无疑问。这也是大多数学者所公认的。因此，我们就没有理由怀疑这个名称不是出自印度语而另去乞灵于伊朗语。不少学者之所以要从印度语以外去寻求 Kharoṣṭha 的词源，无非出于两种考虑。其一，由于佉卢文字源自阿拉美文字，而阿拉美文字是由古波斯人带到印度来的。其二，由于想不出佉卢文字与驴唇有何关系，因而要从其他各种意义去找寻误译的根源。现在我提出另一种解释可以使上面这两个问题都得到解答而用不着从印度语以外去寻求词源。

在《大集经》(Mahāsamnipāto)(引自《法苑珠林卷六·日月篇第三之一·星宿部》)中记载了一个神话故事，对“佉卢虱

吒”一词的来源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兹节述如下：

据殊致罗婆菩萨说，在世界之初日月星宿尚未创造时，有一个国王的夫人，因贪淫欲，与驴交合，生下一子，“头耳口眼，悉皆似驴，唯身类人而复粗涩，駮毛被体，与畜无殊。”其母惊怖，将此儿投于厕中，但却被一位称为“驴神”的罗刹妇救走，“将往雪山，乳哺畜养”。“及至长成，教服仙药，与天童子日夜共游；复有大天，亦来爱护。此儿饮食甘果药草，身体转异，福德庄严，大光照曜，如是天众同共称美，号为佉卢虱吒（注云：汉言驴唇）大仙圣人。以是因缘，彼雪山中并及余处悉皆化生种种好花好果、好香好药，种种清流，种种好鸟，在所行住，普皆丰盈。以此药果，资益因缘，其余形容粗相悉转，身体端正，唯唇似驴，是故名为驴唇仙人。”其后，这位驴唇仙人学于圣法，乃告诸天众，为说创置二十八宿及日月年时之次第。于是“一切天人、仙人、阿修罗龙及那罗等”都称颂驴唇仙人“于天人间最为尊重”、“智慧慈悲最为第一”、“一切天人之间无有如是智慧之者”云云。

我们分析这个神话故事得出下面几点结论。

第一，这是一个关于开天辟地、创造宇宙的神话故事，它具有明显的民间传说性和原始性而不同于一般宗教僧侣所创作的说教故事。因此，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古老的创世传说，后来被佛教吸收，增加了佛教的内容，在汉译过程中，又增加了中国天文学的成分；但对于这位驴唇仙人本身的故事仍保存了原始传说的本来面目。

第二，根据这个传说，驴唇仙人之得名，是因为他虽具有人身而保留了“驴唇”之故，这就说明此仙人名与梵文 *Kharoṣṭha* 一词的本义相符，并非出自其他语族某词的误译。

第三，这个故事一再提到“雪山”。驴唇仙人是在雪山受哺育成长的；由于这位仙人的福力，又使雪山地区成为美好的仙境，

可见这位仙人与雪山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印度文献中，“雪山”常指兴都库什山而言。由此推测，这个神话的产生地应在兴都库什山附近；换言之，这个神话应当是兴都库什山附近地区古代居民中普遍流行的创世故事。

第四、驴唇仙人是被人们尊崇为一切天人中最有智慧之神，他的法力足以创置日月星宿和历法。也可以说，他是与创造文明有关的大神。

现在，我们再来考察佉卢文字与这个神话故事的关系。

佉卢文字的母体阿拉美文字是由古波斯帝国的征服者引进印度河流域的。在巴基斯坦白沙瓦附近的坦叉始罗古城遗址以及在阿富汗喀布尔附近等地都发现了阿拉美文字的资料，可以表明波斯文化传入印度的路线是先通过喀布尔至白沙瓦之间的地带，然后才扩大到印度河流域其他地区、旁遮普和恒河上游各地的。佉卢文字之所以产生就是为了改变阿拉美文字使适应于书写印度语支的西北俗语；而据英国著名语言学家霸洛(T. Burrow)的考察，佉卢文字所书写的西北俗语，其发源地即在白沙瓦附近。由此我们可以推想，佉卢文字就是在古波斯帝国征服印度河流域的时代由喀布尔至白沙瓦一带地区的居民发明的。这一带地区正位于兴都库什山以南，与此山紧相毗邻。关于驴唇仙人的神话故事也可能就产生在这里。如果这个设想有理由成立，那么，此地的居民把他们所发明的文字归功于他们所尊奉的创造文明的大神而称之为佉卢虱吒文字，这就完全可以理解了。例如，中国古代把文字之发明归功于苍颉，苍颉也是一位神话人物。然则，佉卢虱吒文字的意义乃是“驴唇仙人所发明的文字”。此与《普曜经》中列举“梵天所说之书”、“富沙迦罗仙人说书”正复体例相同，亦可称之为“驴唇仙人所说之书”。又可证明《法苑珠林》中以梵天、佉卢、苍颉并列为三大文字发明者之说不为无根。由此言之，佉卢文字是根据人们假定的发明者驴唇仙人(即佉卢虱吒仙人)而得